

一群丹麦妇女正在水中做有氧运动。

美好生活

在改善健康、增进国民的幸福感方面，丹麦、哥斯达黎加和新西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经验

阿娜丽莎·R.巴拉、亚当·贝苏迪、安娜·贾奎里

在维护国民的健康和幸福感方面，丹麦、哥斯达黎加和新西兰这三个国家施政得当，名列前茅。

案例研究表明，这三个国家之所以表现突出，关键在于在社区层面高效地提供服务，培养社会各界之间的信任，且政府最高决策层对国民的福祉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让民众的心情陷入谷底，让我们认识到，许多形式的幸福感和对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

杰弗里·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也是年度《世界幸福报告》的合著者——该报告根据生活评估调查对各国进行排名。他说到：“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幸福感”或欣欣向荣的生活，又如古希腊人所谓的“幸福”（eudaimonia），是一种“至善”（summum bonum）。幸福并不意味着愉悦或者情感上的高潮，而是指过上美好的生活。”

丹麦：关键在于信任

根据科迪莉亚·切斯纳特自己的统计，她至少进行过3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在丹麦解封后，每次想要追求自己的业余爱好打羽毛球时，都必须出示检测阴性证明。

她说，这些免费且易于安排的核酸检测，对于确保他人的安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保持一点快乐来说，是一个小小的代价。这也是个好例子，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很多丹麦人将自己的行为视为集体努力的一部分。

无论是基于理性的利己主义还是纯粹的利他主义，社会信任在丹麦都是最重要的。国民相信政府会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政府也相信国民会维护丹麦的社会结构。人们相信，丹麦民众都会为了更多人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疫情期间，的这种社会现象帮助丹麦成功遏制了疫情的传播，且相比其他国家，疫情造成的人员损失也相对较小。

切斯纳特是一名36岁的丹麦人，也是一名难民问



一家丹麦人正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点。

题顾问，他说到：“我希望我自己能身处在安全的环境中，这就需要其他所有人都遵守相同的规则，且我们相信政府的举措是适度的。”

在幸福感和满意度指标方面，丹麦始终排名靠前，研究人员在解释这种现象时，经常会指出信任这一最重要的文化特质。丹麦人的这种社会信任感植根于丹麦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会提供高额的失业补助、免费的医疗和高等教育机会，还会为儿童保育提供大量补贴。

“政府建立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将人们的财富再分配给陌生人。如果一个人对陌生人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的话，他不可能赞成这类制度。”丹麦奥胡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比约恩斯科夫说到。

比约恩斯科夫最近出版了《北欧各国的幸福感》一书，他说到，信任几乎是丹麦和其他北欧社会独有的文化特质。但他认为，丹麦人之所以拥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不仅仅是因为良好的社会福利，更得益于信任、宽容、强大的制度、长期向好的经济形势和具有韧性的民主制度。至少有一个丹麦市镇的政府官员在制定议程时，会将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附近，有一座风景秀丽的渔村德拉厄，2014年，该渔村的村委会就曾对当地居民进行过一项调查。

“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社区最关心什么，村民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幸福感的基本源泉是什么，”时任市

长 Eik Dahl Bidstrup 说到。

村委会联合丹麦幸福研究所开展的这项研究发现，村民希望政府能为大家改善休闲设施。而政府根据研究结果为村民新建了一座室内游泳中心，并改善了镇上的体育设施，还增加了面向老年人的设施规划，对镇上的历史中心和港口等公共区域进行了修缮。

现任丹麦克里桑工会主席皮德斯特鲁普说到：“我们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工作对我们很重要，但休闲时间也同样重要。对社区领导来说，为社区民众提供好的休闲设施，让人们可以充分享受闲暇时间，才是我们的首要工作。”

丹麦人之所以高度信任政府，关键还在于丹麦很少发生官员腐败问题。

丹麦议会议员莫恩斯·吕克托夫特曾于20世纪90年代负责丹麦主要税种和劳动改革，是丹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他说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并不腐败。多数丹麦人都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抱有信心。”

他表示，大多数丹麦人之所以接受高税率，主要原因一是在于丹麦很少出现腐败问题。其次，在形成共识上，丹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20世纪初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个政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发生。第三，政府的总体服务效率很高。吕克托夫特说到：“丹麦人还有一个基本认识，就是政府在教育、儿童保育、养老事业和医疗服务等领域所提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提升企业的效率和劳动力市场的效率。”

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吕克托夫特承认,移民和难民难以融入丹麦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体系压力过重等问题一直被丹麦人所诟病,成为了缩减社会福利的两大理由。尽管政府已经针对这些问题出台了相应举措,但由此引发的移民问题大辩论,已经动摇了部分社会群体对政府的信任。

但是,在疫情期间,丹麦全国上下依旧众志成城,避免了困扰其他民主国家的抗疫政治化问题。

奥胡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邦·彼得森(Michael Bang Petersen)曾牵头开展过一项针对民主国家的疫情响应和应对办法的数据驱动型项目。该项目对丹麦及其他七个国家的40多万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丹麦的抗疫政策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广大丹麦群众对丹麦卫生部门坚定不移的高度信任。截至10月底,在符合条件的公民中有超过75%完全接种了疫苗。在疫情最严重时,超过60%的成年人每周都会进行核酸检测。

“政府在推出核酸检测系统时,我还心存顾虑。国民会不会觉得这种做法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彼得森说到。“但恰恰相反,大家都觉得检测核酸是为了我们彼此的健康着想。我接受检测,不是因为政府要求我必须检测,而是我接受检测可以保护其他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更快地恢复正常生活。”

疫情期间的经历只会让国民更加信任我们的政府,调查发现,超过90%的丹麦人相信国家卫生部门,也会让我们的政府更加相信我们的民众。

彼得森说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治体制的运转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本质上来说,如果你知道,一旦出现问题,国家的政治体制会支持你,那么,你就会信任你的同胞。”

哥斯达黎加:纯粹的生活

Pura vida 译为“纯粹的生活”。在哥斯达黎加,你经常会听到这句话。这句话代表的是哥斯达黎加享誉全世界的一种慵懒悠闲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道出了哥斯达黎加人幸福感的来源。哥斯达黎加利蒙省前国会议员路易斯·阿尔贝托·巴斯克斯·卡斯特罗(Luis Alberto Vásquez Castro)说到:“如果你身体健康,有一份工作,

还有时间陪伴朋友和家人,那么这就是‘纯粹的生活’。”

据《2021年世界幸福报告》统计,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中,哥斯达黎加排名第16位。除捷克共和国外,哥斯达黎加是唯一跻身前20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哥斯达黎加每1美元GDP带来的幸福感是相当高的。

哥斯达黎加经济学家马利亚诺·罗哈斯(Mariano Rojas)教授认为,哥斯达黎加人强烈的幸福感来源于紧密深厚的社会关系和社区意识。“国民性格温存,生活节奏也相对较慢。社会竞争不激烈,大家不需要在职场上竞争升职。”

哥斯达黎加还拥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哥斯达黎加人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和有保障的国家养老金。哥斯达黎加也是中美洲唯一一个实现电力和饮用水百分百全覆盖的国家。

它也是中美洲少数几个实现全民医疗覆盖的国家之一。

几十年来,哥斯达黎加一直将公共卫生放在首要位置,针对最容易预防的致死和致残类疾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20世纪70年代,哥斯达黎加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甚至超过了英国等一些发达经济体。

这些投资已见成效。到1985年,哥斯达黎加成为了拉丁美洲国民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与美国的预期寿命持平。儿童死亡率从1970年的约7.4%下降到1989年的1.7%。

然而,哥斯达黎加之所以能够在中美洲一众国家中脱颖而出,主要原因是它的基础医疗卫生模式。

这种模式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其依托哥斯达黎加在农村和社区卫生项目上数十年的经验,改变了哥斯达黎加的医疗服务文化。哥斯达黎加前卫生部长萨恩斯·马德里加尔说到:“它为社区带去了健康。”

政府会为每个哥斯达黎人指定一个医疗团队(EBAIS),即一个由医生、护士和社区卫生员组成的当地基础医疗卫生小组。卫生员每年都会定点走访自己负责片区内的每户家庭。相关部门会综合卫生员收集的数据以及电子病历信息,设定目标、跟踪进展,将资源集中于高风险地区。

在这种医疗制度推行之初,政府将这种医疗团队派往了哥斯达黎加医疗服务最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然后

才逐步推广到了城市中心。萨恩斯·马德里加尔说到：“有了这项制度，哥斯达黎加政府就能着手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记录了健康的各种决定因素——也即民众的生存环境。它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治病救人。投资健康事业，首先是要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这是看待健康和福祉的一个非常全面的视角。”

有证据表明，此模式效果显著。哥斯达黎加的平均寿命从1990年的75岁提高到80岁（远高于美国）。尽管哥斯达黎加所取得的健康成果令人瞩目，但该国目前的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哥斯达黎加医疗支出的占比仅为7.3%，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0%。

罗哈斯认为，让广大国民享受基础医疗服务是值得的。“快乐的人往往长寿。也因此，政府的医疗支出更少。健康不仅有助于提高人的幸福感。幸福感也会有助于维持人的健康。”

那么，幸福和健康，哪个更重要呢？萨恩斯·马德里加尔认为，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有问题。

她说到：“在哥斯达黎加，我们有所谓的‘社会公约’。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下一届政府只能在上一届的政策基础上添砖加瓦。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会说‘上届政府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毫无用处。’推翻之前的工作另起炉灶，远比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完善代价更大。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必须有远见卓识以及政治意愿。”

哥斯达黎加历来讲究民主，历任领导者都将发展福利事业作为政府的工作重心。1869年，哥斯达黎加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国家。政治学教授克里斯蒂娜·伊基萨巴认为，“哥斯达黎加向来都拥有着开明的精英群体。”

她说：“哥斯达黎加的精英群体拥有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通过大力开展脱贫攻坚斗争，让哥斯达黎加国民一直过着幸福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暴发前，尽管哥斯达黎加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扩大，但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却下降了。这种安全感、权利感和平等感非常重要。”

他们的智慧来源于哪里呢？伊基萨巴解释到：“理性的自利。”20世纪70年代，哥斯达黎加曾经是拉丁美洲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哥斯达黎加的能源主要来自水力发电，但用于水力发电的大坝日渐干



一名来自哥斯达黎加农村地区的男子正在雕刻木头。

涸。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改变了发展路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哥斯达黎加的电力供应就将中断。”现如今，哥斯达黎加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绿色先锋。伊基萨巴补充说：“环境越好，就业机会就越多。”

在哥斯达黎加，人们感到幸福的理由似乎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

前国会议员卡斯特罗证实：“在我出生之前，哥斯达黎加人就已经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国家会在教育、食品和社保等方面为国民提供保障，而且，人们只能通过电影了解战争……这是一个拥有‘纯粹生活’的国度！”

新西兰：“福祉”观点的转变

2019年，为了解决在家庭暴力、儿童贫困和住房等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长期问题，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领导的工党政府公布了一项政府预算。

这份被称为“2019年福祉预算”的预算报告明确了新西兰政府的五个需要优先解决的关键领域，它们分别是心理健康、儿童福利、支持毛利和巴希非卡族群的诉求、提高国家生产率及实现经济转型。该项预算首次公开了政府在心理健康服务和儿童贫困等方面投入的数十亿新西兰元，以及在应对家庭暴力上创纪录的资金投入。

新西兰是一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国家，相比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新西兰在许多福利指标上都有不俗



的表现。但与此同时，新西兰也是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儿童贫困问题也是一大问题。根据新西兰统计机构的数据，2020年生活贫困的儿童数量多达21.05万人（18.4%）。

政府在制定国家福利办法时，最基本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政府要全盘考虑构成美好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医疗和教育的机会，以及强烈的社区参与感。

新西兰财政部前首席经济学家、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希罗尔·卡拉考格鲁（Giröl Karacaoglu）说到：“好消息是，目前，人们有关福祉的观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希罗尔也是《爱你：代际福祉的公共政策》一书的作者。

“我们意识到，除了国民的收入，我们还需要关心其他方面。新西兰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点，2019年预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该项预算中，政府承认了健康和经济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BusinessNZ的首席执行官柯克·霍普（Kirk Hope）认为，在此问题上，我们向前跨出了一步。

“大量投资将会流入到健康系统。我们需要从这些投资中获取优厚的回报。人们的福祉对企业来说至关重

要。不然，就无法拥有高效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还表示，我们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来评估投入产出效果，并为社区赋能。

卡拉考格鲁说到：“想要达到理想的福祉效果，过程至关重要，而过程中最重要的转变是我们要给予社区更多的发言权和资源来推动这种转变。”

“目前，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无法从居于中心的政府得以解决，政府能做的是扮演倾听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想要朝着更加全面的做法转变，意味着政府必须转变在这些问题上的工作方法，以及对其效果进行评估。财政部现任首席经济学家多米尼克·斯蒂芬斯表示，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做大量工作和还要花费一定时间。

“目前，我们也正在做更加全面的思考，究竟如何才能更好提高民众的福祉。不仅如此，我们也在持续加深对福祉的理解。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艾米丽·梅森曾在社会政策领域工作了20年，目前，她在惠灵顿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弗兰克咨询（Frank Advice）。她表示，政府没有使用现有的评估工具。

单从概念的角度来说，“福祉”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我们还需要相应的指标和决策机制，以便实现福祉目



新西兰惠灵顿的游乐场。

标。我们需要社区参与来集思广益，也要吸取前人的经验，并将这些与数据指标结合在一起，观察每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因为，从本质上来讲，福祉关乎的是个体。”

“我们有能力开展统计分析，但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这项能力。”

除其他事项外，在该项预算中，政府还纳入了心理健康方面投入的19亿新西兰元，这其中特别关注了减少儿童贫困问题——这是新西兰总理的一个重点关注。

新西兰心理健康基金会负责人肖恩·罗宾逊表示，在心理健康领域，政府亟需做出改善，但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但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包括在一般诊所和社区中心引入早期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

他还表示：“我们现在的工作中所欠缺的是为人们提供工具，让他们能照顾自己以及周围人，以实现他们的福祉”，他还补充说到，最近公布的10年期心理健康战略就承认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尽管有些人会说，福祉预算的效果目前还有待观察，他们也承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卡拉考格鲁表示：“自2019年以来，政府在后续预算中保持了一致性，即便是疫情给带来了巨大挑战。”

新西兰总理和内阁部儿童福利部门的主任默里·布朗表示，新冠疫情“给我们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儿童和青年福利战略”已经高度关注使用联合应对措施，以改善亟需被关爱的儿童和青年群体的福祉。新冠疫情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布朗表示，“儿童和青年福利战略”由新西兰政府于2019年8月正式启动，其中，该项战略达成了一项共识，内容涉及新西兰青年人希望和需要的强烈幸福感、政府的作为、其他人如何提供帮助等问题。

她表示，当地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向我们展现出了社区的力量，而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力量。

“在以往的政府工作中，我们往往会倾向于由中心出发，设计各种方案，但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分散资源和决策权，与家庭和社区利益攸关方一道设计方案，向毛利人和其他供应方提供资源，制定对他们社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但绝对是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1]

由阿娜丽莎·R.巴拉 (ANALISA R. BALA)、亚当·贝苏迪 (ADAM BEHSUDI)、安娜·贾奎里 (ANNA JAQUIERY) 报道。